

从新轴心时代看对话文明与求同存异

杜维明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 北京大学客座教授)

楼宇烈教授,各位老师,各位同学,我感到非常高兴又能回到北大,和大家交流,向大家请教,每次到北大都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也是我自己感觉到非常难得的学习机会,所以我希望掌握这个机会,讲的短一点,多听听大家的观点。

1985年应北大哲学系邀请,我曾经来北大以“儒家哲学”为题上一门课,可以说是我一生中很难忘的经历。这二十一年来,我访问北大多次,每次都感觉到非常愉快,很亲切,有宾至如归的愉快之感。我这个讲题安排在法律人文讲座来谈“从新轴心时代看对话文明与求同存异”(有人说不是文明对话,其实是对话文明),我思考这个问题是有一段时间的,但是所获很浅。我想,通过和大家交流应该把这个观点提升,把我的视野拓展,所以这也是我能够来这边和大家交流的主要理由。

在公元2006年6月,在夏威夷召开一个中西哲学家会议,我有幸主持了这个会议的一个对谈,是由美国的哲学家罗蒂和意大利哲学家瓦迪诺他们两位的对话。这两位都是现代世界有名的后现代主义者,并且对于所谓宏大论说,包括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一些问题,他们都提出已经解构了,不值得有现代学术素质的学者来探讨这种大问题,我们应该把我们的视野更集中在确实可行的,而且是能够非常确定的一些问题。罗蒂的观点,大家都熟悉,是比较极端的。这个题目是叫做“哲学的未来”,就是五十年以后哲学界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所谓东西哲学这个观点老早就过时了,另外也没有什么亚洲哲学,更谈不上什么比较哲学。所以在组织会议的人看起来,他的这个观点是比较极端的。他认为这些观念过时了。因为现代化的关系,全球化的关系,各种不同的传统,它们的门户就打开了。以前列文森就用过一个观念叫做“没有围墙的博物馆”。你的财富也可以是我的,我的财富也可以是他的,我们都有共享。很多的观念,关于中国文化,东亚文明,儒家传统,基督教传统,这些都可以分享。所以他说,可能最重要的观念,应该是一个混合,甚至更露骨一点说,是杂交的文化,没有所谓特定的文化认同。对他的这个提法应该做一个重新的了解。不管文明、文化、国家,这些认同纠缠不清,有各种不同的选择。我记得1997年在香港曾经做过一次学术讨论,讨论到文化中国。一位学者基本上是在英国受的教育,他说他虽然是中国人,但从来不同中国文化,说我情愿认同加拿大文化,美国文化,乃至法国文化。这种情况是越来越多,特别是年轻人,有各种各样的选择。一般说,天涯就是在我的身边,我可以跟非洲,跟莫斯科,和各个地方的朋友做交流,我对那些文化有种强烈的认同感,那么天涯若比邻的同时,比邻也若天涯。跟我附近的人呢,我没什么可沟通的。这是现代人所面临的各个

不同的困境。如果大家接受这样的观点，罗蒂的观点，那我今天讲述的观点基本上没有太多的意义。可是罗蒂的观点是我要讨论问题的背景。他另外讲了一个更极端的话，他说世界上，将来也许只是一种语言，在他没有来中国之前，他坚持这个观念，来了中国几次之后，他说也许是两种。（大笑）但是就是这么一两种语言，其他语言像法文、德文各方面都有问题。他的这一说法，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德国开始接受了他的外籍劳工，就是土耳其人，成为德国公民。在德国讲土耳其话的人特别多，也许五十年以后，我们到柏林旅行，最重要的语言不是德文而是土耳其文。当然如果我们到美国旅行，大家也知道，在加利福尼亚州，可能有坎拿达语（Kannada）比英语更重要。他所描写的这个现象，我们耳熟能详，特别在信息传播非常迅速的时代。

但是另外一个对话的对象，就是意大利的哲学家瓦蒂默，他也是一个后现代主义者，所以他和罗蒂有很多沟通的地方。但是他说，我最近要回归天主教，他澄清他以前不信教。这对我也是个很有意思的大课题。我就从他的这个问题开始讨论。为什么二十一世纪宗教的课题，特别是传统重大的宗教课题，提到议程上来了？在公元2000年，世界经济论坛开始重视二十一世纪宗教问题和二十一世纪的认同政治。当然从经济，从地缘，从各个方面来考虑，我们所了解的世界地图一直在变化，特别是从经济的角度，我们可以把世界各个不同的国家，用经济的指标排列起来，高度发展的、正在发展的、发展非常迟缓的甚至是没有发展可能的。如果我们来看这个世界，从文化地图的角度，特别是从宗教，大家都非常熟悉，可是我想我们过目一遍，也许对我讨论的问题有点关系。在地图里面占最大部分的应该是基督教。基督教分成三个大的教派，我前面提到瓦蒂默意大利人回到天主教，从梵蒂冈的理解，现在世界上可能有十亿。也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宗教，但是到底怎么样去理解？作为天主教徒之间有很多不同的观点，我们暂时不讨论。另外就是新教，新教我们一般叫做基督教，这是不对的，因为天主教也是基督教。基督新教有各种不同的类型，影响非常大，而且新教现在在拉丁美洲影响到天主教徒，许多天主教徒不离开基督教，但是离开天主教，就跟梵蒂冈没有关系，而进入新教。另外我们也知道所谓的儒教文化圈，就是在东亚，韩国的基督教发展非常快，现在可能是百分之三十三以上了。韩国人他是由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合并起来的基督徒。它另外还有一派，就是大家熟悉的东正教。如果你到莫斯科，到俄罗斯去旅行，就知道东正教的力量非常大。已经去世的教皇，他一生可能最大的意愿，就是如何使罗马所代表的天主教与东正教能够有对话。可是他这一生没有机会到莫斯科。东正教所代表的地区，基本上和天主教所代表的传统有好几个世纪的分离，没有办法交流。这是第一个大块。第二个大块就是大家熟悉的伊斯兰教。伊斯兰教一般我们以为在中东，伊斯兰教的世界，主要是伊斯兰大国，最大的就是印尼，像马来西亚、巴基斯坦、印度，伊斯兰教徒非常多。在中国，回回，加上维吾尔，大概也有两三万左右。印度教不仅在印度，在东南亚乃至在印尼都有它一定的影响，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精神文明。我们说基督教代表宗教，那么印度教是不是宗教？值得讨论。因为印度教也是文化，它没有上帝的观念，但它有梵天的观念。当然大家所熟悉的是佛教，佛教传播世界各地，大乘佛教，所谓长老佛教的传统，多半在东南亚。所以我们很难以地域的观念来了解佛教。很难说这是佛教的文化圈，基督教的文化圈，伊斯兰教文化圈，还是儒教文化圈，不容易界定。

儒教文化圈我们比较熟悉，就是整个东亚。这中间牵涉到一个很值得争议的课题。亨廷

顿教授就认为日本应该不属于儒家文化圈，它有独特的性格。但是研究日本最有影响力的一位学者赖世和，曾做过美国的驻日大使，也是一位汉学家，日本学研究的尖端学者，他写的一篇文章主要在批评日本特殊论。那篇文章的题目就是《中国文化的文化圈》，从全球来讨论中国文化圈，那是1974年在《外交季刊》发表的。在那篇文章里面，他坚决否认日本特殊论的观点。他说假如日本能发展，假如文化的因素配合经济、政治其他的因素，给予经济发展以积极的作用。那么下面四个地区会有发展。当时还没有四小龙啊，四小虎的观念。他就提出南韩、台湾、香港和新加坡。同时他也说，当时在越南战争，越南情况非常惨烈，假如越南的和平能够重新建立，越南是属于儒家文化圈，会有发展。再来他提到中国，假如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有一些重要的调节，中国会有发展。当然他还有一个观点，现在还没有成为事实，北朝鲜必定发展，意思就是说这个儒家文化圈所代表的价值。这是他的观点。这个文化地图，跟宗教、宗教文明有很大的联系。对这个问题我已经谈过很多次，很多朋友可能已经耳熟能详了，不必回应。

但是所谓轴心文明，对大家可能也是熟悉的观念，这个提法是德国哲学家雅士伯斯（Jaspers, Karl 通译雅斯贝尔斯），他在二战以后（就是在1948年）就一直在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二战之后，人类从非常残酷的阶段过来的，重新回头来审视文明。他认为有四个典范性的人物对人类文明的影响很大。一个是苏格拉底，作为希腊哲学，在欧洲的影响很大，一个是孔子，一个是释迦牟尼，还有耶稣。到今天的话，大概还要加上穆罕默德，还有其他人。他提这样一个观点，里面有一个基本预设。大约在公元前六世纪到一千年，在各地独立发展的一些重大人物。他们之间互相没有关系，一直到了二十、二十一世纪，至少二十一世纪的前半段，还有很大的影响力，还在塑造人类文明。就是我刚才提到的从文化地图上来看。在公元前6世纪左右，也就是在孔子的时代，在释迦牟尼的时代，在亚里士多德时代，那时候在南亚所发展出来的基督教和佛教，在中国的儒家、道家，在中东的主要是伊斯兰教和基督教，都是从犹太教一根而发，乃至在希腊的哲学，这些传统当时出现，我们从历史回顾，他们有许多交流。印度佛教传到中国发展，成为有中国特色的佛教传统，又发展到日本、韩国、越南还有其他地区。希腊的文明当然也是。阿拉伯世界保存了很多古代希腊文献，如果没有阿拉伯世界保存的这些文献，中世纪的欧洲就很难进入文艺复兴。从文艺复兴进入后来的启蒙，发展的是阿拉伯的传统，也就是伊斯兰的传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虽然如此说，这几种文明相对独立，它有发展的内在逻辑性，有它的影响。在传统世界，有些人就是生活在基督教的世界，有些人就是生活在佛教的世界，有些人就是生活在伊斯兰教的世界。他们没有接触到西方的文明。这是轴心文明两千多年甚至更长时段的大趋势。

在很多年前人们就考虑，所谓轴心文明，它有没有特色？什么叫轴心文明？美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在七十年代举行了一次世界性的学术讨论会，名字就叫做《超越的突破》。我的一位老师史华慈先生直接参加这次会议的讨论。在这个时代人类对于一种终极的关怀与向往，以上帝的观念出现，这是整个宗教发展过程中间重要的优势，犹太文明最大的功绩，希腊哲学里面逻辑 logic 的出现，印度教里面的梵天观念的出现，在中国关于天、关于上帝的观念，也许这标志着人类文明。他重新来讨论它的根源性。从这方面看，是轴心文明的特色。后来有批学者包括我在内不满意这种观点。因为另一个观点其实就说明了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是代表了宗教的特色，超越了上帝甚至超越了外在的上帝，成为人类文明突破的标志。

从那个标志来考虑的话，那中国文化是特殊的，它和原初的，没有进入轴心文化的那个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也许它的突破性就不全面，就是由于它的突破性不太全面，所以整个中国文化的发展就有保守的倾向。那么从另外的角度来看，假如我们类似的轴心文明突破，不仅是上帝、梵天这些观念的出现，同时是人的自我反思的一次飞跃。人对所有重大事件课题进行反思，数学、逻辑学，但是除了这些之外，犹太教方面对于它的人所自来最原初的智慧的有上帝观念的出现。那么中国对人的反思，何为人？我们做人的道理是什么？为什么要做人？这也是一个非常深沉的反思，也是一种突破。这个反思能够意识到天的观念的出现，但天一定就是超然外在的东西，也许和我们人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但是这些都是所谓终极关怀，是毫无疑问的。可是事实上，由于启蒙所代表的大的思潮，在世界上起到了极大的影响力，使得其它这些重大的精神文明多多少少不仅受到了批判，而且逐渐地被消解，它的影响力也是逐渐地在减弱。所以我们可以把启蒙以后这个发展过程，以前叫西化，后来叫现代化，现在我们说是全球化，它是个凡俗化的过程，就是把神圣的宗教的这些观念把它凡俗化。可以说是解构，如果用一种更特殊的说法，就是理性的光芒，理性化所造成的对于世界的各种问题重新组合。当然科学技术发展的力量，大家知道不可抗拒，所以马克思·韦伯在定义现代化时就用一个字就是理性化。

各种制度的理性化、市场经济的理性化、科学管理以及所有各种理念的官僚系统，是代表现代化的标志。过来以后，人类进入新的时代，所以从孔德开始，认为也许人类文明有个发展的铁律。这个发展的铁律就是人性，经过形而上学的思辨影响到各个领域，这就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铁律。韦伯是坚持铁律的，所以他对宗教的认识，也是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的。韦伯他讲现代性理论，他一生要考虑的是宗教问题，但是他讲他对宗教没有什么特别的敏感，他要了解以前在欧洲，新教伦理对欧洲文明的发展有什么关系？他对这些问题很有兴趣。但据他自己讲，他已经和宗教没有多大关系，他是个理性的现代人。这个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学者荣拉巴（此处听不清）就写了一个《宗教进化论》。他的说法就是人类文明如果从宗教来看，早期有种部落的宗教，现在来说就是原住民的宗教，也许新石器时代有宗教信仰。部落宗教在现在还在发展，慢慢地出现了轴心文明所代表的历史宗教。这就是我们文化地图里面提到的，在这些所有的历史宗教中间，只有一个宗教传统，从历史宗教变成前现代宗教，这就是基督教。基督教从以前的天主教的传统，经过马丁·路德的新教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而这个传统又是同资本主义的精神传统合起来发展。所以为什么现代化从西方发展起来，为什么现代化就是西化，就是资本主义。当时我就抗议，我也算他的学生，我说儒家也有它的前现代的宗教，宋明理学。他说这是什么？没有什么反应。我说在印度也可能，不仅是基督教本身。可是现在他基本上完全放弃了他原来的立场，接受了这个观点。所谓的前现代的宗教，在其他地方也出现了。特别是在东亚社会，如果我们要想了解宋明理学，它是经过佛教的挑战以后，不说脱胎换骨吧，发生的重大的改革，和宋明以后中国的发展，有非常重要的关系。这个改变和马丁·路德在基督教上的改变，从它涉及的侧面、它的深层、它的内容价值都是一样重要，这是毫无问题的。研究这方面的人都非常熟悉，确实这个改变没有同资本主义挂钩，没有发展资本主义。所以很多人就说，我们有儒家的商业伦理，想在儒家文化里面找基督教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和它相同的关系。这基本上对中国作用甚微，因为这是个特殊现象。资本主义只有在西方发展，其他地方可以发展，但是只有在西

方发展出来，这也是历史事实。所以从鸦片战争以后，我们向西方学习，一直到今天。这个过程不可逾越。虽然我们发现很多可以跟基督教传统相比，但事实上只是在儒教传统中发展。

虽然如此，我们可能会问这样一个问题。往前看，不是往后看，往前看，它有哪些特点？是不是一个事情发生以后，那个发展的趋势就一定限定了以后的发展，还是说这个发展到了某个程度，可以多人多样？这就是我们要讨论的一个很重要的背景问题。即使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的精神有很密切的联系，即使启蒙所代表的理性，或者说所代表的科学主义，理性主义，确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高峰。可是现在的情况有很大改变。我们都非常熟悉，最大的改变之一就是启蒙，当时很多人，当然也有很多浪漫主义者，相信理性的光芒是不可抗拒的，黑暗是一定没有办法和光芒抗衡的。只要有光芒，黑暗就被驱除。如果说我们这个房子里面算是一个小宇宙，只要这个光能够亮，每一个不同的角落，它的各种情况我们都可以看见。所以一直有个很强的信仰，就是科学的理性逐渐地发展，使得我们以前不了解的东西逐渐能够了解。所有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基本上都有这样一个观念。现在的情况为什么复杂呢？就是我越知道我应该知道而不知道，我越能够理解，我越应该看，我越能够意味着我应该理解应该看见无知之物，或无知的领域扩大的越大。像有些学者的想法，就是最小的、最少的物质基础，只要我们分析最小的地方，我们知道它的终极，那么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重建我们的宇宙。可是现在发现，越小却还是一样的复杂。追求真理、追求事实，这个强烈的意愿在科学界还是一个主导的因素。但是另外一个情况的出现，就是为什么我们以为过了几千年以后已经消解掉了形而上的行为，乃至宗教，在我们今天二十世纪的后半期，特别到二十一世纪，它的力量更大？一般理解，认为有冲突的地方，我觉得这种理解很肤浅。后面有非常深刻的、深沉的重大问题。

华东师大的冯契先生说，现代中国所碰到的问题就是古今中西之争。其实我们现在所碰到的问题，是重新来了解古和今，传统和现代之间的复杂关系，我不能想象没有传统的现代性，我们也必须要探讨现代性中的传统问题。我编个论文集，哈佛出版社的，就是《东亚现代性中的儒家传统》。所以“传统”和“现在”这两个观念从传统延续到了现代。传统社会的消解现象到处都可以看到，各种不同的建筑物，各种不同的经济方式，农村逐渐变成都市。美国农业人口已经降到百分之二十三，工人的人口一直在降，服务业人员在增加，各方面的都在变，所谓的传统已经没有了。我们常常在问我们的传统是什么？我们的传统没有了，传统被消解了，这就是现代性。可是你要了解法国，你不了解法国的近代史，中世史，你很难了解法国的革命精神和法国现代的社会关系。如果不了解英国的传统，很难了解英国的现代性。不了解美国的市民社会，也就不能理解托克维尔到美国所讲的美国的民主特色。这些地方有它自己的特色，这种特色又和它的生活习惯、心灵的积习有密切的关系，又和传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举一个关于中国的例子，这也为很多人所接受的，大家认为中国最杰出的一批知识精英，特别在五四时代，对传统进行了非常严厉的批判。抛弃传统，丢掉传统的包袱。所以他们了不起的地方是能够跳出传统，从一个崭新视野来了解中国文化。所以他们是反传统的，但是这些反传统的知识精英，包括比较极端的，像鲁迅、胡适之、陈独秀、李大钊等都可以包括在内，又都是强烈的爱国主义者。强烈的爱国主义者就表示说，中华民族现在受到那么大的屈辱，那么大的蹂躏，将来她是要起来的，将来是要站起来的。看鲁迅所写的东西，关于阿Q这方面，已经是到了无可救药。可是他气势如虹，尽管无可救药，我们中国人

到了这个程度，应该是悲观的，可是他不是。他有非常强烈信心我们能够站起来，我们能做成。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有很多资源，当然不止是儒家的、佛教的资源，更多的资源在起积极作用，这是一个民族发展不可逾越的复杂规律。另外因为他太乐观了，认为可以把传统像包袱一样扔掉，没想到所谓的传统是渗透到我们的血液，到我们的骨髓中的，是不是DNA？我们不知道，DNA是不是能遗传？我们不知道。但有些人认为经过好几代人的努力，经过好几千年的努力，逐渐这个传统的很多因素同我们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即使在短时间内把它消除掉，但是在长时间对你潜移默化，对你的影响，特别是你开始自觉了，它的影响，它发挥的力量很大。从这个角度来了解传统与现代的不同认识，中西也是一样，所以冯契先生说古今中西之争。

西方的学者像我的同事亨廷顿，他常常用这样一个观点，就是西方和西方之外，特别是美国和美国之外，美国现在也感到好像对欧洲不能够同日而语。虽然如此，西方一直是在西方之外。鸦片战争以后，通过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到了各个地方包括非洲。在二十世纪后期，特别是二十一世纪，很多非西方的人，有的是通过劳工，就是外劳，有的是投资，有的是学习，有的是被聘到了西方，这影响非常大。在整个欧洲看起来很明显。我刚刚讲到德国，大概百分之十的人口是外国人。日本相对是比较封闭的，不太接受外劳，但日本的外劳也是实力很大。这个情况就是人口的流动影响价值的流动。举一个例子可以说明问题。新加坡只有五百万人，但是她的外劳很多。新加坡人夫妇多半是工作，早上九点到下午五点，所以孩子多半是请保姆，常常是从菲律宾来的保姆。最近新加坡发现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他们的未来是掌握在菲律宾的保姆手上。（笑）她们怎么样教导这些孩子，她们怎么样看待价值。所以他们现在对于菲律宾来的保姆，从各种不同的方面，给她们好的条件。到了星期天，他们最大的一条街整个开放。她们在里面可以野宴、可以歌唱、可以娱乐，使得她们一天非常愉快，至少每周有一两天非常愉快，心情非常舒畅，这样的话对新加坡的未来做出很重要的贡献。

所以说现代的话，我们用一个新轴心时代，这也不是我提出来的，很多学者谈到的。第一个是复杂化。非常复杂，这个和现代化形成对比，现代化有趋同，就是大都市，有大飞机场，有星级的酒店，有趋同化的情况，但这是非常负面的情况。如果现代化是一个趋同过程的话，那么全球化是一个复杂的东西。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地方化、地域化都同时出现。而在这个过程中，毫无疑问，是科学技术导引，而科学技术本身包括科学家本身，对自我认识都有了很大的变化。像《论语》里面所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个观念，你越对自己了解，越知道你从事科学研究领域所碰到的困境，既然无知的领域越大，既然知和不知之间的距离也许永远没有办法填补，那么我所了解的比较好的科学家，有个特殊的素质，他们都很谦虚，非常谦虚，不仅谦虚，而且有种崇敬感，对他所研究的对象，不管是生物，不管是太空，有种崇敬感。因为这中间有太多没有办法理解的东西，而且他们特别突出学习的观念。《论语》第一个字就是“学”。他了解到最基本的物质结构本身就是多人多样。我是没有研究科学，可是我有很多朋友研究科学，我的妹妹专门研究分子生物学，她和她的朋友提到这样一个观念，我说我觉得人类非常了不起，我们人的基因谱系全部弄出来了，在很快的时间里，进行克隆啊，很多事情都会出现。她说这是一方面，在技术层面有这样的可能，如果从科学，最核心的科学理解，就是我们现在已经有这个地图了，地图中有很多因素，

但是这个地图应该是活的地图，而不是死的地图。活的地图的意思就是所有我们能看出的一两个点之间会互动，它只要一动，整个地图就会变，而且动的方式没有人可以理解，就是你再做试验，头脑大，电脑再快，你不能够完全掌握。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谦虚呢？我们知道整个地图，我们知道整个光谱，但他们中间互动的关系太复杂，这一来的话，更感到不知道要经过几代人，或者要更高的科技才能进一步了解这个世界。所以在这个方面我得到了这样一个灵感，就是从学习的角度。我们中华民族现在在经济上面起飞了，世界都非常关注，在政治上也有影响力。但是我们文化的信念是什么？我们的学习的对象应该是什么？我们应该如何学习？从文化上，从精神文明的角度，到底轴心文明（这是很关键的）是不是对我们有什么意义，还是我们已经进入另外一个世界，因为全球化的影响，以及科学技术的影响，所有的精神文明对我们的生活不相干？那么我们要问这样一个问题，即使从纯粹的政治策略考虑，我已经提过一两次，我们要跳出一二三四五的思考模式。我们总是希望如何能与超级大国打交道，不一定超英赶美，但是这个超级大国对我们的影响太大了，所以我们的注意力应该集中在超级大国。尤其超级大国有些很重要的一些资源，其中最重要的资源之一是它的教育。不是中学教育，不是大学教育，而是它研究型的教育。现在世界上，没有办法相比。所以我们总希望向他们学习。我觉得这个观念基本上是错误的，只是一个参照。作为一个民族，而且是有着几千年文化的民族，要进入这个多元多样世界，不可能是一种标准，不可能是一种方法。

那么有的人说，我们还是应该坚持两条不同的路线，一是资本主义的路线，一是社会主义的路线。我觉得这不现实。不现实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两条路线之间的复杂关系，已经不是我们理解的那样单纯。像美国的罗斯福，因为当时整个就业崩溃了，所以政府马上进入社会来做各种不同的调控。它在那个时候对社会主义的影响很大。欧洲生活最好的几个国家，北欧，像瑞典，像挪威，像丹麦，都是社会主义。但它那种社会主义绝对是资本主义无法达到的。你只要到瑞典，所有的公共汽车都是不要钱的，所有的医保都是不要钱的。因为他们现在人口在减少，如果你有一个孩子，那你会得到很多利益，如果有两三个孩子，你就不必出去工作。如果你有一个孩子，那母亲就可以放假一年，父亲也可以放假半年，为了培养孩子。有很多很多的好处是美国社会、欧洲其他社会没法相比的，但他们也有他们的缺陷。像丹麦就五百万人，人口跟香港、新加坡的差不多，那么瑞典、瑞士、五十年以后，一百年以后，他们的存活问题，他们的语言问题，非常令人担心。

很多学者，包括我很敬重的一些学者，说现代的世界，应该承认中国的“鼎”，三极考虑，我们现在不能说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这个说法也许太傲慢了，也不要说二十一世纪是亚洲人的世纪，但二十一世纪最少是北美、欧盟，东亚。东亚以中国为主，这三个地方，这三极是我们了解的世界。我在十几年前就说我们要注意印度，你不要把印度忽视了。因为印度给我们参照的地方非常多。现在毫无疑问印度在兴起，所以世界经济论坛在去年有龙象之争。所以有些学者就说三极不对，加上印度吧，那你以为俄罗斯就等在那边？俄罗斯现在起来了，他有油啊，而且他有非常深厚的文化传统，当然我们对它的文学、对它的哲学比较了解，但是对它的宗教不太了解。一般的印象，俄罗斯垮了，中国改革开放成功了，俄罗斯整个爆炸，但爆炸他的碎片集合起来，现在力量也很大。十年、二十年内，我相信俄罗斯的经济会发展。它是领土上最大的国家，是欧亚最大的帝国，欧亚两洲都跨了。像土耳其，百分

之九十的领土都在亚洲，但它就是想进入欧盟，上次我在伊斯坦布尔说，也许五十年后欧盟想进入土耳其也不一定，不要认为这个世界的变化一定遵循某一种模式。所以我们不要从一二三四五这种思路，应该有更宽大的视野，世界各种不同的文明，包括拉美的文明、非洲的文明、世界各地的文明，都可以为我们借鉴。而且我自己认为，并不是现在中非高峰会议的关系，而是非洲有一种很特殊的资源，这我们平常不太了解。除了说物质资源之外，它的生物的多样性、地质的多样性，另外因为它是地球最大的热带地区，有人种的复杂性、语言的复杂性，种种方面。现在看来，非洲完全没有办法发展，而且艾滋病的问题都出现了。但是五十年以后，我们怎么能想象，能不能判定非洲绝对是人类发展中的一个变种？我觉得也不能肯定。作为中华民族，经过几千年的发展，而且经受了一百多年的屈辱，现在建立了自己的主体性，而且这个主体性是开放的，有反思能力，能够面对世界，能够面对全球，所以不能只将目标集中在几个简单的发展模式之上。

可是如果要谈轴心文明，特别要谈我现在特别要说的对话文明，最大的挑战还是现在我们每天都碰到的，就是我们对于现在最强势的意识形态，也就是说思潮、有影响的文明，应该作什么样的回应？因为我以前讨论过这个问题，对启蒙所代表的伟大的西方精神价值、我现在只提出一个问题，比较现实，就是我们对于经济人，一个人完全从经济的角度，我们对于这样一个人，我们应该怎样去理解？我们是不是能够完全认同？还是说我们现在还没有到经济人，我们想办法做到经济人？还是说经济人的本身有限制？我先不作一个明显的价值判断。所谓经济人，就是一个理性的动物，了解他自己的利益。在市场，当然不是纯粹的自由市场，但基本上是一个能运作的市场，扩大他的利润，只要不违背法律。这是一个经济人的观念。不仅要学习经济学，我们还学企业管理。我们很多人心里面接受了经济人的观念。因为这观念下面带有几个非常深层的价值。第一个价值就是自由，就是我们的选择。全球化的发展，个人的解放，以前讲个人解放还有阶级斗争等其他方面的内容，全球化对于个人的解放影响太大了，每一个人的选择扩大了，沟通的渠道多了，信息的来往大了，对自己的需要、需求大了，很难满足一个人的需求。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当然了解到我们的利益，这个对自己利益的了解和自由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有个经济学家布坎南（Buchanan）认为在经济市场的发展过程中，只有一个价值是最重要的，就是自由。所有其他的价值都可以和自由联系起来，假如没有自由的价值，真正的通货的市场经济只能短期发展，不能长期发展，只能够偶然的发展，而不能持续的发展。另外，它确实突出了理性的观念。这个理性是工具理性，不是一般的所谓沟通理性。工具理性，他是理性，能够了解到从手段得到目的的因果关系，对中间的复杂机制都非常了解。另外它确实有权利（right）的观点，特别是我的隐私权。有些是我的权利，任何其他的人不能干扰。我记得在八十年代，一位学者到美国留学，提到想把这个隐私带到法律界，困难非常大。特别是在家庭，母亲说，你有什么隐私，我们都是在一个家庭，对你这样的关爱，你何必要求你的隐私权？那么一个学校一个社会也是如此，你要隐私那你就一定有些不可告人的东西，那是对社会的危害，要不你为什么要求隐私？再来就是法制，没有真正的法制就没有诚信，就没有基础，没有契约。诚信度的考核，美国、欧洲、日本意识非常高。在欧洲，意大利比较低，在中国的情况非常严重。这些都是应该开发的价值。

可是我刚才提到的那位经济学家，后来提出这样的观点，特别是针对跨国公司，因为很

多跨国公司的财富远远地富可敌国了，有些人的财富，把世界上五六十个收入比较低的国家总和加起来，也没有办法同他们相比。所以他说必须提出责任问题，如果只有自由没有责任，这批人就可以把我们的整个资源浪费了，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最近呢，他又说除了责任之外，还要有善良的因素。我是觉得特别惊讶，作为自由经济学者，这个人有善心。那么他后面根据的是一个人的常识。在伟大的思想里面，有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也就是说越有钱、越有权、越有势、越能掌握资源、越能掌握信息的人，即所谓精英，越应该对于这个社会的秩序，所有人的福祉负责任。他应该照顾弱势群体，弱势群体作为牺牲者，他可能没有任何责任能够承担，只要他们能活下去就是尊严。在中国长时间里面，我们只要能存活下去就是尊严，我们不应该有任何责任，我们没有资格，也没有理由，也没有能力对世界其他的问题负责任。当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也到非洲，到各个地方去，但基本上成为一个被牺牲者，你的存活本身就是能活下去就是尊严。但现在不是，既然不是了，那么你的责任问题就出现了。你的责任是不是够？布坎南（Buchanan）认为是不够的，必须还要有责任心。那么我想如果是这样，也许可以把这个问题摆到更宽广的视野，也就是在1968年的12月24号，我特别记得这样一天，因为在这个时候，人类第一次可以用我们的肉眼看到地球。就是因为太空人的关系，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肉眼看到整个地球，很全面。经过相当长一段日子，科学家慢慢地让我们了解到，这个蓝球，这个蓝色的行星，它的矿物、它的土壤、它的水源等等，现在更严重了，它的空气，都受到伤害了，像矿物的匮乏、土壤的流失、水源的枯竭。张岱年先生和季羨林先生就在二十世纪人们因为油的问题引发很大的矛盾冲突，也许到二十一世纪，水的问题会引起更大的冲击，为人类冲突的重大问题。现在当然还有空气污染，如果从这个方面再看其他更现实，有些人说五十年以后，七十年以后，我们这一代人已经没有了。贫富不均的问题、失业的问题、社会解体的问题，乃至因为核武器的杀伤力，到底人的存活应该怎样去理解？西方资本主义的课本有个漫画，就是说我们都在一个救生艇里，救生艇很大，但是它已经开始倾斜了，因为很多水已经漏上来了，有很大的漏洞，很多人已经受到侵袭，上面站着两个人，他们两个人说话——幸好我们是在最里面，我们在这一面。现在整个世界在沉沦的，很多人能够理解，但是我们为了要发展，环保这些问题都在讨论，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从这个角度来看，从儒家的传统、中国文化的传统看，人应该是宇宙的一个观察者。在《易经》里面讲“观”非常重要，了解世界。我们观察宇宙，是个观察者，所以我们在本质上就可能成为欣赏者。只要到风景好的地方，我们了解了自然就能欣赏。从《中庸》讲我们还是个参与者，“参天地之化易”。我们这样说，人在本质上应该是创造者而不是创造物。他可以成为创造者，演化的过程到了现在，很多从事演化研究的学者，发现人已经成为演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不是演化的，我们现在对于演化变成一个积极或者是消极的因素。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一定会成为一个重要的破坏者。“天作孽仍可存，自作孽不可活”，人也许可以战胜各种不同的自然灾害，但是人自己作的孽，将是我们不能够存活的主要原因。这个理解使得很多从各种不同轴心文明来讨论问题的人，发现我们应该把人类现有的、能够集聚的各种不同的智慧开发出来、积累出来，来讨论人类的存活问题。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谈文明对话。为什么说文明冲突是个比较肤浅的问题，而对话是比较深刻的问题？文明对话的问题，讨论怎么样把人类文明从轴心时代积累下来的所有重大的

资源，调动起来解决我们现在人所碰到的困境。从长远来为我们找出一个方向，为我们找出一个道路，让我们对自我的理解，有更深沉的资源自我反思能够更全面。我1980年在夏威夷参加一个主题讨论，我们发现雅士伯斯所讲的那个文明对话还是太狭窄，也就是说主要是大文明之间的对话，我们这些文明要同所有的原住民文明，各个地方的原住民文明，也能够积极对话。我们在夏威夷的时候，很清楚地了解到这样一个现象。不仅是轴心文明，还有原住民的文明，再有对各种启蒙，对各种不同文明的一种新的理解。当然现在环保问题是最主要的，理性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最近也有很多发展，都能够配合起来，一起来讨论现在碰到的重大问题。在这个对话的语境中间，对话不仅是一个解决矛盾冲突的方式，也成为一种内在的价值，成为我们一种生活的模式。因此我才提出希望走出一条和平的对话路，一般来说这个太理想化，其实一点都不理想化。我们每个人的经验，从早上一直到晚上休息，大半的时间都是在对话，有时候是吵架，有的是辩难，大半时间都是在对话，只要和其他人接触。有的很简短，有的很精细。跟一个人从认识到熟悉，到慢慢的理解，到有互相体会个人的不同，然后进行沟通，乃至于共鸣，最后成为知己，这些都是对话。为什么人生难得一知己？因为真正对话的实现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对话的最低要求就是减少矛盾冲突，通过互相沟通，这是不可或缺的机制。我参加了联合国的文明对话之后，我自己个人进行了相当长的基督教与儒学对话，与佛教的、基督教、伊斯兰教的对话，乃至于原住民，犹太教，这中间我有些例子以后可以跟大家共享，现在因为时间的关系，暂时不说了。那么最低要求是容忍，容忍本身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价值。但实际是最重要的，是必须承认对方的存在是一个不可消解的事实。如果把对方当作敌人，我一定要把他消灭掉，甚至要狠打落水狗，使他没有能够恢复的可能。容忍是不够的，一定要承认对方的存在，而对方存在的不可消解性要接受。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对话根本没有开始，可是双方都接受了对方的存在不可消解，这是一个基础，有了这个基础才可能互相尊重，尊重是非常困难的，有了尊重才可能互相参照。我不仅承认你的存在，而且我从了解你来了解我自己。因为能够互相参照，才能互相学习。那么这样说来，对话的目的不是利用这个机会来说我的道理。传教不是对话，要想对方放弃他的信仰接受我的信仰，这不是对话。对话也不是利用这个机会来表述我的一些价值，譬如我用这个机会来向大家宣扬儒家学说的核心价值，这不是对话。除非各位提出许多问题，我想办法回应。对话也不是说因为我受到很多的误解，我找到一个机会把各位对我的误解来重新进行厘清。那对话目的是什么？

对话的目的第一个是培养倾听的能力。如果不能听就不能对话。我发现我们的学术讨论的时候，有些学者智慧非常高超，学问非常渊博。唯一的缺陷就是他不能听，只能说，越说越多。当然他可以发展他的智慧，但这不是对话。对话最重要是靠听的能力。

第二对话是可以拓展我们的视野的。我举我自己个人的经验，我和基督教徒的对话时间是很长的，特别是与神学家，因为跟神学家的对话，使我了解到儒家传统不仅有它的缺失，还有它潜在的可能。我特别重视儒家的宗教性，我不认为强调了儒家的宗教性就消解了它的价值。但是如果没有基督教对我的刺激，我不会了解到儒家文化的重要性，只是把儒家当作社会伦理。大家可能都清楚，在犹太教里发展对话，最重要的学者就是马丁·布伯。他用了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他说我看树，我可以从植物学家的角度来看，来分析它了解它，把树当作它者，这不是对话，就是把树当作我欣赏的对象，我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作试验，就是以

它的存在来丰富我自己本身对外界的敏感度，另外加深自己的反思能力。这后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就是“和”，和谐的“和”。人作为一个观察者，作为一个欣赏者，作为参与者，作为创造者，特别我们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我们不仅要吸收其他的文明、其他的社会乃至宇宙大化的资源，来增加我们对自我的了解，扩大我们的视野，强调我们的认知能力。在这个新的情景之下，在新的时代，希望能够有新的对话文明出现。我们对科学界所提出的追求、科学家提出的重要价值，还是尊重的，也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同时我们也要提出认真地，或者真切地体会人生的意义问题。我们更注重在人的日程活动当中，是个意义问题。在企业管理，这方面大家相当了解，一个人做什么工作，企业将来做大了很成功，但人生的意义在哪里？这是一个人的文化认同，也是他的一个终极关怀。

从这个角度来看，对话文明的观点出现不是偶然的。日本有个学者池田大作，在两三年前和我联系说要进行一次对话。他提了个题目，就是文明，下面一个题目是：冲突还是对话？我说这个我不愿意。因为一谈到冲突就回到亨廷顿提到的地缘政治文明冲突模式中去了，我们要想的问题应该更深刻。我就做了一个提议，我说我希望题目叫做期待或者面向对话的文明。他非常高兴，接受了。他说我们加一句，就是世界和平的哲学反思，希望对话文明的出现。我们是在对话文明中，我们也希望增长经验。在学校与学校之间，在政府与政府之间，能够发挥它的影响力。但这不是一个浪漫式的、理想式的说法，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考虑，不是手段、目的、方式，不是工具理性，而是沟通理性，不仅是追求真理，追求事实，掌握外界的客观世界原则，同时更发掘各种意义，阐发我们对自我的认同，这中间应该有自我。我认为它是透明的，它是公开的，可以跟大家分享。所以这个对话的文明应该是种新的生活方式，通过文明之间的对话，而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对话意义。

世界七大宗教需要互相沟通，为什么需要互相沟通？很明显，现在的宗教领袖碰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也就是人类存活的问题，以前像在佛教里面，有说是现在世界是尘土，彼岸、净土是最主要的。但是在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基本上是下来的人间佛教，人间佛教就是要把净土带到人间，净土带到人间的意思就是他参与世界，他要进入政治，他要进入文化。我们不能等到天国，我们今天的世界也就是我们的世界，我们要好好的保护它、珍惜它。所有的宗教领袖，都要发展出新的观点，为了世界和平或者说世界公平，这个观点的出现，对于新的终极关怀，是从容忍到承认到尊重，到参照到互相学习这个过程。我们个人可以这样说，人与人之间相遇，从一个陌生的人变成知己，只是一个过程。在文明之间，这种过程有没有可能？我就说这同“和”有密切的关系。但是我们对“和”常常是误解的。在论语基本精神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我可以这样说，希望不造成误会，“和”的对立面不仅是乱，而且是同，同是和“和”对立的。异，就是差异是和的必要条件。没有异，就不可能有和。首先我要说同，同有健康的一面，但我认为同有极不健康的一面，极不健康的一面是趋同，殊途而同归，大家都非常熟悉。大同，是中国最重要的思想，为什么是大同？大同是很多不同。这也就是说，每一个观念都是自愿，都是参与的，都是双向的。小同不然。我们用一般的观点，同济、同道、同仁、同事、同辈、同乡、同学、同门，这些都是很好。如果不能是自愿的、参与的、双向的，如果不能真正地协调，它的紧张、冲突、矛盾，不能够通过协调，通过磨合，逐渐完成，这就很难达到“和”。

家庭的“和”为什么那么困难？家庭既有性别，又有年龄，又有权威，又有地位，只有

三五个人就有那么复杂的差异的因素，所以要“和”是困难的，但是如果“和”的价值能够创造出来，对于一个人的人性发展有非常大的价值，所以“二人同心其利断金”。王阳明找到湛甘泉，在没有找到湛甘泉之前，他已经失望了，没有再发展的前景了，后来突然遇见了湛甘泉，个人情况完全不同，但是对他所讲的认知完全能够认同，他觉得非常兴奋。另外我们知道“同心棋友其臭如兰”。但如果同变成同质的，单调的，而且不是自愿的参与到和，那就确实犯了“小人同而不和”，而不是“君子和而不同”的禁忌了。君子为什么“群而不党”？有“和”的观念，但不是同，是一个开放的视野。这个思路中华民族在孔子之前就已经展开了。张岱年、汤一介、乐黛云、楼宇烈很多教授都谈到。像晏婴，在《左传》和《晏子春秋》里面都有记载，公元前五百年那时候齐侯就对他讲，我和梁丘据，我们两个是和的。晏子就说你们不是和，你们是同，你说了算他听。如果是和的话呢，那么君甘则臣酸，君淡则臣咸。这不是唱对台戏，而是如何从异达到和。和因为是多样性，一定含有异，所以后来他举了个很好的例子，就是烹调。我们要有盐、要有梅、要有水、要有火，慢慢的煮。另外我的一个例子，你要成为一个艺术家，你要画画，你用一种颜色不行，我曾经有一位朋友，他只用一种颜色黑，但是到他的画室，经过一段时间了解，发现是各种不同的黑。有比较淡的，有比较浓的，假如就是一种漆黑，那就根本不可能成画。另外，“和”，特别是和谐，是音乐的观念，作为音乐的观念更值得我们去关注。它有各种乐器同时配合起来，有弦乐，有管乐，像编钟，有打击乐器。在西方的乐器里面有小提琴、管乐、打击乐器，从表面上看来完全不同，可是它们配合起来同时奏乐，那就很好。在中国，我记得是1978年我在武汉，刚刚在随县出土了在战国时期一批乐器，有七千多件。那乐器非常多，非常复杂。中国听的艺术，也就是音乐的艺术，在很早就达到很高的水平，孔子本人对音乐欣赏就很高明。中文里面很多的字都跟音乐有关系，如甚至的甚字，声音的清和浊，声音的大小，句子的短长，速度的急徐，感情上的哀怨、刚柔、和缓、高下。因为是“和则相济”。“和”是生命，是创造者。“同则不济”，如果是“同”的话，就没有办法济。必须充分理解“异”的重要性。当然有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就是说你讲烹调，音乐，那谁是大厨？谁是画家？谁是艺术家？谁是指挥家？我的回应是这样，在一个多元的时代，前面我也提到，我们要对各种不同的文明学习，对轴心文明所带来的多样性，从多的角度来理解，能够直接参与烹调，参与指挥，参与音乐创造的，应该是来自不同的民族。在今天的社会，有政府，媒体，有企业，有各种不同的社会组织、社会力量，都能参加的话，这是属于“和”。“和”的方向应该是“中”，中道的“中”在滋润“和”后面的价值。

最后做一个小小的结论。仁有两个特色，一是觉。觉悟的觉，也就是感觉的觉。“哀莫大于心死”。有的学者说儒家的传统是德性伦理，如果是德性伦理就同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很接近。怎么能够通过长期的培养，把我们勇气的等级，人性的等级培养成为我们自己一部分？我想儒家传统有这样的德性伦理，但是儒家还有另外一种伦理，就是同情关切的伦理，关切他人，也关切自己，就是己利利人，己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恕道和仁道所发展出来的这种思路，不希望出现的情况是麻木不仁，对外来的世界没有敏感度。是觉的话，他是生命力，因为是生命力，他有创造性，他是种源头活水。

有了仁，除了有觉以外，还有健，健康的健。它是一种合理性，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通过仁的滋润，逐渐达到和，而这个和才是比较丰富的。所有的儒家核心价值，都要靠仁来

制约，没有仁，它的核心价值等级就有滑坡的危险，没有仁，义就会变得非常苛刻，礼就变成形式化，智就变成小慧、小聪明，信也可能变得非常狭隘。但是所有这些所有核心价值都可以丰富仁的思想。仁叫有差等的爱，和博爱、兼爱不同，并不表示只爱自己亲的人，爱自己的家人，爱自己的民族国家，不爱人类。不是，最基本的精神就是它是有活力，有创造力的，它是从近到远，推己及人。在这样的发展过程中间，它的核心价值和自己之间形成一种对话，而且这个对话可以成为文明对话的基础。和，这样说来，是又有内容又有活力，发展出来的文明对话，就是一个学习文明问题。中华民族了不起的大智慧大聪明就是学的问题，特别是最近几十年来，我们向世界各个地方学习，向西方学习，也是迫不得已。但我觉得往前看，学习的力度要加大，希望这样的视野更加开阔，这样达到一种“和”的价值，应该可以作为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华民族进一步发展的一个参照。

[责任编辑：连佳佳]

[录音整理：刘成荣]